

著书人语

幸好有文学这根拐杖……

| 钱红莉 文 |

这些年，一直无所建树，时间大都浪费在厨房了，别无所求，别无所余——这样体面的托词，似对一个灵魂，颇有些安慰。

每每读书，遇见饮食段落，不免啧啧生津。一本《山家清供》读下来，只记住两样菜——傍林鲜，蟹酿橙。据传，后者杭州目前尚有两家酒店做得出；至于傍林鲜，但凡春来，三两知己，去竹林边，垒几块顽石，找一堆野柴，炙烤出的嫩笋烫得很，左右手来回换，焦糊的笋衣剥了，吹吹凉，小口吞食，想必甜脆鲜洁，满目林下之气。《山家清供》读来，甚觉可亲，清气俨然。到了《红楼梦》，景况急转直下，对于富贵人家种种奢靡吃食，不禁掩鼻——烧一碟平凡茄子，也要刻意运用花腔女高音，掩其本味，以彰显贵族之家的优越……连世相之外的妙玉也要嫌憎刘姥姥，将老人喝水的杯子一并弃之。读这一两节，不免尊严受辱——仿佛我于精神上，幻成无数刘姥姥的分身。

一个有着想吃一块油炸锅巴都要被母亲羞辱的童年历经的人，对于《红楼梦》里的吃食，有着天然的隔膜与排斥，不比《金瓶梅》平实日常，宋惠莲用一根柴火炖烂一只猪头的亲切，颇为接近饮食上的“本我”。

去秋，与同事一行三人结伴往滁州，公务之余，顺道游过醉翁亭，晚餐被安排于琅琊山下一间不起眼的酒店，有一道菜无比惊艳。一只尺半见方的米色陶钵，牛乳一样的汤汁里，鱼头、鱼丸分庭抗礼。那样的鲜腴之味，至

今难忘。餐毕，与同事夜色下闲话，一边赞叹鱼丸之美，一边又想起当地人吴敬梓，《儒林外史》作为一部有趣之书，唯一的遗憾是，少见铺排任何美食，纵使叙述婚宴饮场面，也不外乎平淡无奇的一桌菜式，客人刚要动箸，房梁上一只打群架的老鼠掉下来，不偏不倚正落至一碗汤里……同事言，吴敬梓不比曹雪芹出身富贵，一个贫苦小说家如何在小说里“做出”饕餮盛宴呢？是啊，马二先生游西湖，饿了，也只能啃几块烧饼。若说切半斤牛肉，也是不可能了。

张爱玲在《谈吃与画饼充饥》里，细淡回忆起儿时天津常喝的鸭舌炖小萝卜汤，学会了压住鸭舌根上的一个小扁骨头，往外一抽抽出来，“像拔鞋拔子”，形容鸭舌滋味“清腴嫩滑”；还有另一道汤：猪腰子、里脊、小萝卜同煮……滋味想必清嘉。她写什么，都有神来之笔，让人舌下生津之余，不免雀雀然欣欣然。除了她，还有汪曾祺。老夫子笔下食物，无论慈姑、萝卜，还是荠菜、菱角米，都有生命的本意在。蕴藉深厚的笔触里，让你品出的不仅仅是饮食之道，尚有许多无以言说的余韵。这样的尾韵，像极秋夜江水气息，凉凉地贴着人，整个身躯犹如一块为月色所沁润的璞玉躺在茵草席子上，与星辰万物浑然一体了。这一向都在读他的书，床头、电脑桌上，堆得山似的——不！并非赏玩，而是学习，一点一点咂摸这文字的珍珠之美。于老夫子的文字浸淫久了，一颗心似也变得柔软，静气、寂气，一点点地，亦如穿梭于

宋元古画，白鹅啊，红蓼啊，芙蓉啊，孤柏啊，秋水啊，一齐近了，又远了。

汤显祖借《董西厢》说文章结尾有两种：煞尾和度尾。煞尾如“骏马收缰，寸步不移”；度尾如“画舫笙歌，从远处来，过近处，又向远处去”。

无论汤显祖，抑或张爱玲、汪曾祺，这些离我们远去的人，为文当真是字字皆精致讲究。回头审视我这一本薄书，尽显粗疏拙讷。一次次修改，愈发颓丧，以致最后一遍校样上狼藉一片，是酷热潮湿的天气里，拍死无数的蚊子血，并深感惶愧。

写这篇小文时，厨房灶上文火煨着一罐牛肉，不时有香气飘来。这样的一日三餐，大抵是生活的底气，它叫人不必这么患得患失。正是这一口鲜活的热气，将人留住了，不至于坠身于虚无。生命里，想必还有几样值得追求并珍视的东西。

昨日黄昏，一个人漫步屋后荒坡，渠内遍布芦荻，秋风徐徐，众鸟归巢，苇絮蹁跹，忽地想起苏辙《和子瞻归去来辞》的一句诗：气有习而未忘，痛斯人之不还。陶潜原诗是：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陶诗悠游，一颗心放下了。苏辙没有，他尚在“痛斯人”之境地。

纵然中年已至，我似仍处于“未忘”之境，生命中，处处有辗转、痛苦、放不下。

一路行来，跌跌撞撞，幸好有文学这根拐杖……

《我买菜去了》，钱红丽 著，安徽文艺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

书人书事

《百花文廊》杂忆

| 顾模立 文 |

《百花文廊》是我近四十年前创办的墙头文艺园地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序幕刚拉开，全国各地到处沐浴着温馨的阳光，即便我这名“黑五类子女”也有幸入了党，并调入当时的无锡县查桥公社，担任党委秘书兼成人教育辅导员与通讯报道员。从读中学开始，我就喜欢写作。后来，不管是在学校当教师，还是在农村“修地球”或是在工厂工作，我总见缝插针写些散文、小说之类的文章。进入乡政府大院工作后，工作关系让我结识了一大批跟我一样怀有文学梦的作者，有县机关派驻机构的干部，有乡机关人员，有学校教师，有社办厂工人，甚至还有农村普通青年，这些人怀作家梦想，急需一个能适合于他们写作水平，能交流切磋创作经验和体会的平台。经过几年的寻觅，我终于找到了这个机会。

原来，乡政府围墙进行了翻新，大门两侧预留了十来个宣传橱窗，橱窗原来打算开辟成阅报栏，供镇上居民路人浏览阅读，但报纸数量不多，大部分橱窗还都开着天窗。于是，我便找到乡党委组织委员老陈商量，是否能将其利用起来，办成一个墙头文艺园地，好让文艺青年有个发表作品，交流创作经验的地方。老陈也喜欢写作，他一听我这个建议，表示赞同。我们立刻向乡政府有关领导提出申请，竟还争取到了每月50元左右的经费，用

于购买纸张、颜料，发放稿酬和劳务费等开支。至于刊名，我们多次商量，决定叫作《百花文廊》。从此，我又增加了一项份外工作，为文廊组稿、改稿，组织人员誊写、插图乃至张贴，直至造表报账，事无巨细，我都要亲自过问，亲自操办，但我乐此不疲。

《百花文廊》一出刊，就受到了本乡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学青年的喜爱。本乡农村知识青年冯国贤等开始在《百花文廊》上崭露头角，接连发表了不少作品。本乡有一位姓刘的现役军人，在探亲回乡时看到了家乡有这么一个文艺创作园地，在休假回部队后不久，也给我们寄来了一篇相声稿，由于体裁不很相符，再加上篇幅太长，我们只能忍痛割爱。《百花文廊》三期之后，在外知名度迅速升温，竟然吸引了不少外乡文学创作爱好者的目光，东亭、安镇、厚桥、张泾乃至洛社等乡镇的文学青年纷纷寄来自己的作品，期望在《百花文廊》刊出。仔细想来，李鸿声同志也送来了小说《草垛》稿件，驻乡税务员钱雨晨也多次送来散文、小说稿。

《百花文廊》的誊写、插图，都由镇上各单位学有专长的人士担任，其中有中小学教师、粮管所主任、供销社干部。每到出刊前夜，我只要一个电话，这些人便会来到乡政府会议室，在吃过一顿便饭或是一碗面条后，大家便既分工又合作，投入紧张的工作。夜深了，大家还会去橱窗里张贴。

《百花文廊》刊出的作品大多为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偶尔也发表一些特写、小演唱、电视片解说词乃至漫画作品，每期刊出8000—10000字左右。说实在话，我这名“主编”本身就是“半桶水”，加上兼职太多，分身无术，《百花文廊》刊出的作品自然还是比较粗糙、幼稚，但经大家尽力而为，倒也图文并茂，五彩缤纷。每期《百花文廊》新刊，前来欣赏的人常常是络绎不绝。现在想来，这些作品虽然质量参差不齐，但都来源于生活，因而内容多样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在办好《百花文廊》的同时，我们还组织开展一些创作交流活动，虽然是“鸽子教鸪鸪”，教者和学者水平彼此彼此，但毕竟起到了教学相长、取长补短的作用，其中不少青年作者就是从这里开始，逐渐掌握了文学创作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巧，并在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长进。这些活动的开展，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，也培养和促成了一些佼佼者走上了业余文学创作之路。

《百花文廊》出刊20多期，历时两年有余，终因我调往县府办工作而无疾而终。时过境迁，时光已去近四十年，我从不惑之年“晋升”为耄耋老人，但每每想起这事，脑海里便浮现出《百花文廊》这朵既小又丑的花朵，她萌生在花团锦簇的文艺百花园里，虽然，她的生命短暂，甚至还来不及绽放便已枯萎，但是，她毕竟在许多人的心坎上走过了一遭，刻上了一道浅浅的印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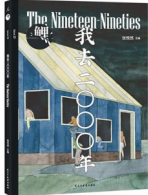
上架新书

后浪四川人民出版社 55元
于是译
《波兰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著，
《云游》



奥尔加·托卡尔丘克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，“她的叙事富于百科全书式的激情和想象力，代表了一种跨越边界的生命形式。”她善于在作品中融合民间传说、神话等元素，观照波兰的历史命运与现实生活。

张悦然主编
理想国·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《鲤·我去二〇〇〇年》



在世界正准备去往2020年的时刻，于杂志中潜入上世纪90年代的回忆，这也是80后作家们给予逐渐远去的少年时代的一次集体性省察：毕赣、笛安、杨庆祥、李静睿、周嘉宁、魏思孝、班宇、郑执、春树等以不同形式回溯属于2000年的记忆。

南京大學出版社 60元
金晓宇译
《爱尔兰约翰·班维尔著
《时光碎片》



巴黎之于海明威，是一场流动的盛宴，都柏林之于班维尔，同样如此：乔伊斯、叶芝、贝克特等纷聚于此，在都柏林寻找自己的文艺梦。在班维尔的引领下，一场奇妙而独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铺展。

工人出版社 60元
陈应松著
《神农架》



神农架系列集合了作家陈应松关于神农架所有的中短篇作品，共《巨兽》《金鸡岩》《独摇草》三册。开始于2001年起的神农架写作，是陈应松重要的写作标签，该系列小说通过建构亦实亦虚的地理版图，试图恢复自然和世界在人类意识中的神性光辉，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现代伦理。